

学术论文选

1979 — 1982

历史学下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学 术 论 文 选

1979—1982

(历史学·下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九八三年三月

编 印 说 明

为了检阅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院科研工作的成绩，促进我院科研工作的发展，开创我院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决定编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1979——1982)。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9年以前，个别有较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或调查报告，也考虑予以收录。1983年起，编印年度的《学术论文选》。

《学术论文选》既是反映我院科研水平的结集，又是我院科研成果的园地之一。编辑的方针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学术讨论；倡导优良学风，注重联系实际；强调科研质量，务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学术论文选》收录论文、调查报告、资料汇编和译著等。不收录已成册的专著。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成果，均可挑选收录。《学术论文选》的收录范围，限于本院成员的著述。

《学术论文选》后附相应年度的“学术专著目录”和“学术论文目录索引”。

《学术论文选》(1979——1982)的篇幅为：经济学部分三卷，历史学部分两卷，哲学部分一卷，外国社会科学情报部分一卷。

主 编：廖建祥。

副主编：曾牧野、张磊、何澄宇、施汉荣、张绰、张难生。

历史卷责任编辑：方志钦、黄彦、蒋祖缘、李默、江敏锐。
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

编 辑 委 员 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孙中山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张 磊 (1)
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	方志钦 (26)
析同盟会的衰亡	方志钦 (58)
中华革命党与倒袁运动	王 杰 (74)
介绍孙中山《致郑藻如书》	黄 彦 (104)
介绍新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黄 彦 (116)
介绍《孙中山选集》校订本	黄 彦 (149)
论朱执信的民主革命思想	张 磊 (158)
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张 磊 (182)
广东共产党小组成立考	
——兼答元邦建同志	沙东迅 (194)
广东最初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研究	沙东迅 (209)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	黄振位 罗尚贤 (22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蔡畅在广东的	
主要贡献	黄振位 (241)
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高恬波	杨绍练 元邦建 (253)
广东海员的光辉历程	江敏锐 (276)
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论省港大罢工	江敏锐 (308)

论华侨对省港大罢工的支离	江敏锐(318)
伟大的革命壮举	
——兼论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	黄振位(332)
工人赤卫队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杨绍练(347)
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	金应熙(355)
十九世纪前半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	
两次起义	金应熙(363)
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对老挝的控制和侵略	金应熙(383)
十九世纪中叶前的越南华侨矿工	金应熙(403)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方志钦(413)

孙中山与1924年 广州商团叛乱

张 磊

从1924年开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在孙中山所主持的革命政府所在地——广东，酝酿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当时虽然还处于萌发状态，但是，已经展示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曾有过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历史的必然。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并策划了首次武装起义——乙未广州之役以来，他的革命的“战争事业”已经有了三十年历程。严峻的现实却是：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形成了一次政治的思想的解放运动；但这场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在终极意义上则是失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没有变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后来，孙中山举起了反袁和护法的旗帜，继续同攫取了革命果实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和各派军阀进行斗争，经历了真正堪称“艰难顿挫”的十年时光。然而，旧民主主义革命业已临到了终结期。反袁的结果不过是“去袁”而已，北京政府依旧为北洋军阀所

把持。第一次南下护法，不免被西南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所排斥。二次护法的结局更为悲惨，竟以披着革命党人外衣的新军阀陈炯明导演的炮击总统府而告终。孙中山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然他始终坚持探索 and 追求。他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曙光。孙中山以“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准则检验了过去的活动，回答了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他“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①他确立了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开始建立革命的武装；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在1923年初重返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期的作为，使得广东成为当时的革命策源地。

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不安、阻挠和破坏。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伸出了反革命的触手。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②广东地区的革命化，不仅意味着它对这个富饶和重要的省份丧失了控制权，同时，也威胁到了它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重要据点之一的香港。所以，英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窜踞东江地区的陈炯明，“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③同时，又加紧勾结和利用依附于它的广东买办阶级，把他们控制的商团、商团军变成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①《毛泽东选集》，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10页。

③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载《响导》第107期。

以便在革命策源地的核心——广州策动反革命叛乱。

1924年10月发生的商团叛乱，成为当时民族、阶级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桩事件的进程，展开了尖锐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是广州革命政府同英帝国主义支持的、为买办阶级控制的商团（以及地主豪绅掌握的部分“乡团”）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营垒内部的斗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军人同国民党右派以及厕身革命队伍的军阀官僚的斗争；而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又交叉和揉合起来。从八月初旬扣械潮起，直到十月中旬商团叛乱被弭平，事变进程十分曲折复杂，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变生肘腋的商团叛乱，对孙中山和他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经受了斗争的磨砺。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在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的推动下，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孙中山对商团采取了基本上坚决的态度。虽然，他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曾经有过犹豫和动摇，甚至一度作出过错误的北伐决策——这主要是国民党右派、中派对他实行包围和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孙中山及时克服了这些消极因素，在关键时刻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人民的主张，对商团叛乱进行了镇压，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策源地，从而，为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

广东商团的建立，大致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夏，省城首先组织起商团。佛山商团于次年建立。江门商团则成立于1919年。一些县城（如香山县石岐镇）则是在1923年前后组织商团的。商团的宗旨“原为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

起见”，而对“其他事项，概不干预。”^①由于商团成员所需枪械服装必须自备，所以，出丁者多为资本丰裕、人手众多的店铺。充当商团军的大都是资本家、少东和高级职员，间或也有雇人充代的。小商店则出“月费”，从经济上维持商团。商团的领导权，无例外地为商业资本家所掌握。又因为广东毗邻港澳，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商户多带有买办性，其中不少人就是买办或洋货商。1922年后担任广州商会会长、商团团长的陈廉伯，就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②少数商团则由豪绅充当头目，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是曾担任过省警察厅秘书长的恶霸地主^③。

从20年代初(特别是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英帝国主义积极扶植和控制商团。原有商团多以“自卫”为名大加扩充。没有商团的城镇则纷纷兴办。孙中山在1923年于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后，省城商团“更加扩充，向加拿大购买步枪千数百支，由……北京陆军部发给入口护照，海关又为英人所掌握，上下一气。”^④到商团叛乱前，它在全省范围内已经成为一支数量不小、装备精良的武装。广州商团共有十团，合计四千余人，连同后备力量，约达六千余人。^⑤佛山商团有一千六百余人，分为十二个分团，并与近郊地主阶级控制的四十六乡团相结纳，组成四十七乡联团保卫局。^⑥

①《粤商商团议草》，载上海《民立报》，1911年5月6日。

②陈廉伯16岁即入沙面汇丰银行，很快就担任了买办和入了英国籍。
参见陈果：《广州商团叛变后的陈廉伯》，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③陈骏千等：《佛山商团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④李朗如等：《商团见闻》，载《广州文史资料》第1辑。

⑤丁文江：《广东军事记》，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⑥陈骏千等：《佛山商团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江门商团虽然建立较晚，成员也达一千余人，分为九个分团，装备不逊于省城商团。^①甚至连香山县城石岐的商团，也有四五百人。^②商团不仅配备着长短枪，而且还置办了机枪。

商团的反动政治倾向，还在叛乱前就已经显示出来；随着广东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反革命性质愈益增强。他们反对孙中山制订的革命的三大政策，攻击“联俄”、“联共”是“赤化”，污蔑“扶助农工的政策是挑起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恶感，来坐收渔人之利。”^③同时，商团又是资本家压榨工人阶级的工具：“自商团军成立以来，其压迫我工团，残杀我工友之事，不胜枚举。如江门之役，围困油业工会，乱枪射击油业工友，惨被拘囚拷打者廿一人，失踪者六十二人。其余香山小榄理发工会之被捣毁枪击与强掳，石岐集贤工会工友，因罢工制止起运之被枪伤与击沉，新会葵业工友之报行纠察，而强被囚禁，大良辗谷工会，去年罢工时之横遭围困，四会理发工会，因加价而惨遭蹂躏，最近本市酒业工会因调查会员，而惨被枪伤三人。……”^④商团的反动行径表明：它不是什么商民“自卫”组织，也并非对政治“概不干预”，而是一支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别动队。商团头子听命于港英政府，英帝国主义分子曾经教唆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从中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

①黄鼎三等：《1924年前后江门商团见闻回忆》，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辑；许只：《江门商团始末记》，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②郑仲良：《中山县商团活动概况》，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③陈骏千等：《佛山商团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④《广州工人代表会通电》，载《广东扣械潮》，卷2，第38页。香港《华字日报》稿，1924年版。

中国的华盛顿。”^①他们还同反动军阀狼狈为奸，“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②此外，他们又与国民党右派相结纳。尽管孙中山和廖仲恺曾经对商团进行过教育和争取，但它的领导人的反动本质促使这个组织走上“与帝国主义列强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之进行”的反革命道路。

商团与广州革命政府的直接冲突，发端于1924年5月。当时，广州市政厅财政局决定征收铺底等捐，商团坚决反对，并借此联络附近商团和乡团酝酿罢市。“商团、乡团亦即纷纷向广州集中”^③，数达九十八团。后经调停，政府取消捐税。但商团代表们却于5月28日集议于广州，名为“团务会议”，实为组织“联防”。会议决定成立联防总部，并推举陈廉伯和邓介石、陈恭受为总长和副长；还确定于8月中旬在广州举行“大联团开幕典礼”，以便示威性地大肆庆祝一番。为了加强商团的装备，在“议决全省联防时，同时议决扩充实力，筹备款项，购买军械，并公推陈廉伯经手其事。”^④陈廉伯于是擅自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9841支和子弹3374200发，并由悬挂丹麦旗的轮船哈佛号潜运广州。械弹的购运“初时非常秘密”，但因数量庞大（装为1129箱），终难“瞒过政府”。陈廉伯于是就贿买粤汉铁路局长许崇灏（粤军将领许崇智的弟弟），于8月4日向军政部蒙领护照一张。四天后，械弹运抵省城。“扣械潮”就此引发。商团叛乱的序幕由是揭开。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0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北京版。

②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载《响导》，第85期。

③《广州总罢市的解决与商团联防》，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号。

④《广州当局与商团》，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

二

8月8日，哈佛轮驶抵虎门并泊于沙角炮台附近。商团派轮验看，准备起卸。在此之前，孙中山也从香港获悉了偷运械弹的消息。他先令滇、桂军查办，但杨希闵、刘振寰“奉令而不照行”。孙中山乃于8月9日命令黄埔军校当局处理。10日晨，发现哈佛号已进泊白鹅潭（在广州市区内的珠江水域，其北岸即帝国主义控制的沙面）。孙中山当即飭令永丰、江固两舰将该轮押至黄埔，并把查获的全部械弹封存于军校。^①广州革命政府扣留非法偷运的大批枪械，成为商团蓄谋已久的叛乱的导火线。密云不雨的局势被打破了，各个阶级和政派积极活动起来。

对于蓄意谋叛的商团说来，扣械问题正是一个大乱广州的借口。陈廉伯等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通声气，狼狈为奸；一方面扩大事端，猖狂反噬。8月11日晚，商团头子们以辞职手段煽惑商民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反感。次日，两千余名商团公然列队赴大元帅府“请愿”，蛮横地索取枪械，并以罢市威胁孙中山。13日，“花县商团武装抵省者七百余名”。“三水、佛山……十四埠商团，均备武装来省”。^②15日，省属各地商团到广州参与“大联团开幕典礼”的代表再次赴大元帅府请愿。18日，陈廉伯煽动银钱业罢市并拒收刚刚发行的中央银行纸币。20日，未经政府批准的商团联防总部移至佛山。在“渐次集中全省商团军”的同时，商团大肆污蔑攻击孙中山主持的政府“赤化”、实行“公夫公妻主义”，竭力蒙蔽和胁迫商民罢市。截至25日，全省已有包括广州

①《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第七篇，第43—44页。1937年。

②《新闻报》14日香港电，载《响导》，第79期。

在内的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而“陈恭受在石湾等处，纠集土匪，冒称商团民团，自为攻城总司令。”^①商团一开始便如此猖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目的是要在第一个回合中要挟和逼迫政府作出全面的妥协：无条件发还扣械；允许成立联防总部并撤消对陈廉伯等的通缉令。

从“扣械潮”开始，孙中山就采取了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他在接见商团第一次“请愿”代表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商团头子们的澜言，说明政府扣留偷运枪械的理由，并指出正在查究陈廉伯之流策划颠覆政府的阴谋。^②8月19日，孙中山派代表携带亲笔函件前往商团总所，揭露了陈廉伯的“极大阴谋”：“欲借商团之力，以颠覆政府，而步意国墨索连尼之后尘”；并指出“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③一周后，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商团罢市问题，主张采取果决手段——解散商团，以武力制止罢市。并在接见商界代表时，谴责了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谋组“商人政府”的罪行，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业。”^④与此同时，孙中山和担任省长的廖仲恺还从12日起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桂、湘军进驻广州，以便维持社会秩序，防备商团叛乱。在商团多次拒绝警告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

①《广东扣械潮》，卷2，第51页。

②参见《中国内乱之原因》，载《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04页。

③《国父墨宝》，第97—101页。北方杂志社1948年北京版。

④《广东扣械潮》，卷1，第43—44页。

命勾当后，孙中山决心以“严厉手段对待”，准备于29日进攻商团盘踞的西关，粉碎商团的反革命阴谋。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商团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手段，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他后期思想的深刻变化和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军人对他的支持和促进^①。还在商团叛迹初露的时候，共产党人就指出不可“姑息养奸”，“对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犹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认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在后来的事变进程中，共产党人多次要求孙中山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干扰，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猖獗一时的商团给予迎头痛击！^②广大工农群众对商团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决心组织、武装起来，同商团“决一死战”！总工会在罢市开始后，立即发表《劝告商民复业书》，诫以“勿为谣言所惑”，要求“先行复业”。广州工代会在通电中声讨了商团的累累罪行，表示“誓为政府之后盾”，要求将所扣枪械“全数没收，拨为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③为了发动更多的工人共同向商团斗争，还组织了“劳工同盟救国会”。8月26日，工团军首次进行编制和训练。“人数有三百人，直接受工人部的指挥。”^④广州附近各属农会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合和参与了反商团斗争。这支同反动

①参见《响导》79期——92期的一系列有关论文和述评，主要篇目有公侠：《帝国主义买办右派共同宰割下的广州革命政府》；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和《警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伍豪：《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等等。

②《广东扣械潮》，卷2，第38—39页。

③《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载《政治周报》，第3期。

乡团相抗衡的农民武装，共有三千枪支。^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警卫廖仲恺主持的省长公署。^②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八百余人在29日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广州革命政府掌握和影响的四所军官学校的两千余名学员们大都斗志昂扬，特别是黄埔学生军更为爱憎分明，运械事发后“全体学生表决将其扣留，并准备与商团作战。”^③广州的市民则组织了平糶委员会，准备接管粮店和罢市商铺。广大革命群众纷纷集会游行，支持孙中山对商团的果决措施。8月26日，工农群众还组织宣传队前往佛山。显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给予孙中山以力量和信心，促进他对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采取反击的态度。

事与愿违。商团的胁迫并没有吓倒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反而激起了群众斗争的新浪潮；陈廉伯之流的处境十分孤立，面临着溃灭的命运。在这种形势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从后台走到前台。狡猾的英帝国主义早已通过陈廉伯等紧密控制着商团，并在幕后操纵其活动。他们把沙面提供给陈廉伯作为罢市指挥机构的驻所，并参与了商团的一系列“秘密策划”。然而走狗黔驴技穷，孙中山宣布“要以武装削平祸乱”，于是主子被迫登台——英帝国主义乞灵于传统的炮舰政策，公然出面干涉中国的内政。8月28日，英舰集中于白鹅潭并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当晚，领事

①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载《响导》，第85期。

②《广东农民运动概况》，第49—50页。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编，1927年7月版。

③《广州前敌通信》，载《响导》，第110期。

团向廖仲恺提出“警告”和“抗议”。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帥府发出最后通牒，竟然蛮横地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①但是，英帝国主义的张牙舞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9月1日，孙中山为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尖锐地指出“……二十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盖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谋施对付此项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办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吓！此是何意味乎！盖帝国主义欲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拒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欲对之而发射。”明确表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②同时，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重抗议”。^③在这期间，孙中山还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重申：“帝国主义……不仅是我們走向独立自由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我国的反革命中最强有力的因素。”^④孙中山的义正词严的声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体现了广大人民反帝的意愿，因而，也赢得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支持。^⑤在不屈的革命人民面前，英帝国

①《广东扣械潮》，卷2，第91页。

②《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0—871页。

③《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2页。

④《广州公报》，1924年9月8日。

⑤苏联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孙中山之打倒反革命，非仅中国蒙其利益，且将影响世界全局。”共产国际发表《告欧美工人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号召各国工人支持广州人民的反帝斗争。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9月11日、10月18日。

主义的政治恫吓和军事讹诈遭到破产。

然而，这场短兵相接的搏斗不能不加剧国民党内和广州革命政府内的矛盾和斗争；而革命营垒内部的分歧和争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变进程。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成员良莠不齐的组织，一些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混迹其中。尽管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①但是，他在1923—1924年间所主持的改组并没有把这些腐朽反动分子彻底清除。他们由于历史渊源或其它原因，依然窃据要职和起着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加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致使“党内革命空气陡见紧张”，^②促进了国民党的分化与组合——进一步形成了右派、左派以及中派。左派是孙中山实行新三民主义、贯彻三大革命政策的依靠力量，主要成员为廖仲恺、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右派大抵是官僚、政客、军阀、地主豪绅、买办和投机分子，当时任大本营总参议的胡汉民等是他们的头子。右派的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③右派“口中虽高唱国民革命”，实际上“唯恐得罪帝国

①《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载《政治周报》，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3页。